

性别何以社会学?:中国语境下的研究范式及其生成逻辑

吴小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关键词:性别社会学;范式;女性主义;学科化;中国语境

摘要:本文在对西方社会学的女性主义“改造”进行简要评述的基础上,考察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学中的性别研究从女性研究、女性社会学再到性别社会学的学科化演进脉络,并着重讨论了最近十多年来性别议题在国内多重话语和网络时代极致流量化的压力下日益走向敏感化和空间狭小化的新特点。2012年之后性别社会学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范式,包括以性别为分层机制的权力等级关系范式,将阶级等重要维度重新带回性别研究的交叉性理论和分析策略,以再生产劳动为切入点重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和妇女解放话语,以及反对异性恋正统霸权的酷儿理论与多元性别研究的本土话语,等等。这些范式虽然共享着女性主义的批判性视角,却生成于中国本土的问题和语境,由此构成彼此交错而又分离的多元共同体。在性别社会学构建本土话语体系的永恒追索中,如何在现有国家话语的框架内找到性别自身的社会学想象力,借助包装、挪移等策略进一步拓展研究和生存空间,成为当下这一领域共同体面临的主要难题。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24)05-0001-16

How to Envision Gender in Sociology?

Research Paradigms and Their Regenerative Logics in Chinese Context

WU Xiao-yi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Key Words: sociology of gender; paradigm; feminism; disciplinarization; Chinese context

Abstract: Based on a brief review of the feminist “reformation” of western sociolog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research on gender in sociology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from women’s studies, through sociology of women to sociology of gender. It also discusse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gender issues being increasingly sensitive to the narrowing in space under the pressure of multiple domestic discourses and extreme traffic in the Internet era in the past decade. Since 2012, sociology of gender has formed a variety of research paradigms, including the hierarchy paradigm with gender as the stratification mechanism, the intersectional theory, and analytical strategy that brings back important dimensions such as class to gender-related research. Also included are the social reproductive theory and women’s liberation discours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spreading from reproductive labor, to the queer theory and local discourse of pluralistic research that oppose the hegemony of heterosexual orthodoxy. Although these paradigms share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they are generated from local problems and contexts in China, thus forming a diverse community that is intertwined and yet remains separate. In the eternal pursuit of sociology of gender with localized discourses, questions of how to fi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f gender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existing national discourse, and how to further expand research and

作者简介:吴小英(1967-),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性别研究、家庭研究。

living space with the help of strategies such as packaging and transferring, have become the main issues facing the community in this field.

性别社会学并非经典意义上的社会学领域,因自社会学诞生以来性别充其量只是和年龄、种族、族群等一起作为构成人类基本特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自变量而已,并不成为一个学科领域。性别议题真正成为社会学中一个重要的显性议题甚至核心议题的起源,无疑和 20 世纪 60-70 年代西方女性主义第二波的兴起及其向学术界的广泛渗透有关。但是这种渗透和蔓延一开始只是为了向知识界寻求答案,阐释造成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文化机制,进而建构一种去除压迫、迈向解放的理想知识体系,因而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价值取向,并且以跨学科的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或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为主要范式。美国社会学会(ASA)旗下至今并未有过所谓性别社会学的分会,而只有女性研究的分会(称为 SWS,即 Sociologists for Women in Society)。虽然英文文献中也有零星的以“性别社会学”(sociology of gender)命名的著作,甚至早在 1989 年国内就出版过题为《性别社会学》的译著^[1],但是总体来说非常稀少,尤其是在 SCI 期刊论文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提法是“女性主义社会学”(feminist sociology)或者“女性主义观点的社会学”(feminist perspectives of sociology)。因此可以说,性别社会学只是性别视角进入社会学的一种过渡形态,作为一种学科领域很大程度上则是中国特定语境的产物。而它“无中生有”的整个历程,恰好体现了社会学中性别研究范式在不同时代的中国问题和社会语境下发生的变化。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这个进程,考察社会学中性别研究范式在中国语境下的生成与流变,进而探讨性别何以社会学的逻辑及其未来走向。

一、西方社会学的女性主义“改造”:从议题、视角到范式

女性主义对女性在社会中境况的关注,从一开始就和社会学密切相关,比如家庭内外的性别分工、文化中对于女性和男性的角色规定,以及与身体和性之间的关联性,等等。因此女性主义进入社会学的初期主要体现在批判和补充。批判主流社会学中

对女性议题的忽略、歪曲或边缘化,并将许多新的议题带入社会学研究视野,比如对家务劳动和全职主妇的研究、对工作的重新定义和情感劳动的引入、对性和生育的讨论、对母职和照料文化的阐释,等等。这些在以往社会学研究中被忽略的私人议题的带入及合法化,伴随着新视角下所谓公共—私人领域二分法界限的坍塌——无论称之为性别视角,还是女性主义视角。由此,这种视角不仅揭示了性别背后的权力关系和等级秩序,也揭示了这种关系和秩序的社会生成机制,因而使得性别不仅作为一个需要重新讨论的议题或概念,而且成为考察社会的一种新视角、新范畴和新方法。

然而,女性主义并不满足于只对已有的社会学主流框架进行补充或纠偏。随着研究和讨论的深入,他们发现迄今为止社会学“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门由男性主宰的学科”,而“这一特质对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与教学均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因为这种“男性主流”(malestream)的社会学对于合理化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劣势位置以及延续女性气质在文化上的劣等地位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2(P1)]。也就是说,在既有的社会学知识框架下很难摆脱父权制或者男性中心主义的羁绊,因此当务之急需要建立自己的城池,最终在范式意义上完成新的知识变革,即对西方主流的社会学进行系统的女性主义“改造”。这些改造不仅包含在大学课程、体系、学位中增加女性/性别研究相关的内容、机构和专业,还体现在期刊、出版社、学会等平台 and 共同体建制中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相关主题、书籍或组织的显性化。如美国主流的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简称 AJS)从 1973 年起开始发行《变化中的女性与变革中的社会》(*Changing Women in a Changing Society*)特刊,至今已五十多年,一度成为学术畅销期刊。英语世界中同时代的性别相关著名刊物还包括 1972 年创刊的《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1975 年创刊的《符号:文化与社会中的女性》(*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以及1987年创刊的《性别与社会》(Gender & Society)等^[3],这些期刊为推进社会学中女性/性别议题和视角的传播以及提升女性主义者的学术可见度提供了富有影响力的机会空间和平台。

到了20世纪末,尽管这种改造并没有达到一些学者所期待的所谓女性主义“革命”的程度,但无论是当代社会学理论教科书将女性主义作为重要“流派”之一列入其中,还是性别研究成为社会学概论或方法课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都表明了智识和建制的双重意义上性别研究已完成自己的主流化工程,并在社会学中获得了一席之地,甚至一些女性主义社会学家站在了这一领域以往难以想象的顶尖高地,对社会学整体的知识生产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力。然而即便如此,这种学科意义上的“改造”依然十分有限,或许更大程度上只是停留在基于女性经验的理论探讨和方法倡导的层面上,因此不如说更多表现为一种范式转变。由于范式更多在各自的研究共同体内被奉行和追随,并不一定能成为社会学领域普遍的共识,因此可以说女性主义尽管在社会学议题和知识的纠偏或填补空白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但就学科基本范式的重构而言似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成功。“女性主义社会学既被主流社会学所吸收,同时又被其孤立”^[4],这种尴尬局面至今并没有多大改变,因此在2023年《变化中的女性与变革中的社会》特刊发行50周年纪念会上,许多在社会学领域富有影响力的女性主义学者发出追问:今天的社会学是否真的实现了女性主义所期待的范式转变?^[5]抑或恰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依然未能走出“社会学中女性主义革命的缺失”?^{[5][6]}

事实上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社会学中的性别研究一直聚焦于对主流社会学中男性霸权的批判,并试图建构一种女性主义的社会学,但显然后者比前者更加难以实现。21世纪以来,性别研究在社会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女性主义学者开始怀疑完成学科意义上这样一种统一的“女性主义革命”是否可能甚至必要,原因在于性别研究内部,甚至有关女性和性别概念与身份认同,以及关于女性主义的理解本身,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和分化。人

们开始对“单一的女性视角”这个概念提出质疑,转而强调女性经验与视角的多样性^{[2](pp3-4)}。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女性和性别概念已被黑人女性主义思想、后殖民理论、全球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等思潮根本性地改变^[3],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性别本身业已成为一种“去中心”的概念,它作为一种分析范畴的局限性也日益显现出来,使得性别相关的研究范式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流动的和交叠的。这期间伴随着黑人、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女性主义的兴起,以及与性少数相关的酷儿运动及其多元性别文化在互联网的流行与传播,新的政治与文化语境极大地推进了对以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女性经验为依据的女性主义社会学的反思和质疑,从而衍生出全新的、多样化的性别研究理论和范式。

美国著名社会学期刊《婚姻与家庭杂志》(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简称JMF)2020年回顾了过去十年来家庭研究领域性别相关的批判性分析视角的演变,将之概括为三种相互交织的理论范式:性别视角的理论范式、女性主义视角的理论范式和交叉性视角的理论范式。其中性别视角的理论范式是将性别作为系统性的社会分层机制和不平等框架,包括重新审视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考察性别意识形态对于家庭关系的复杂作用以及挑战既有的性别二元论体制;女性主义视角的理论范式是将女性主义视角作为一种研究和实践方式运用于揭示或改变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的权力不均衡,也就是倡导一种行动导向的女性主义研究范式,包括对社会正义的关注、将性别暴力研究拓展到背后的文化与社会情境,以及将主流异性恋模式之外缺失的多样化家庭成员声音融合进来;交叉性视角的理论范式是将交叉性视角运用于考察和纠正那些针对边缘人群的社会不平等、特权和压迫,也就是强调性别并非单一的不平等和压迫机制,而是与种族、族群、阶级、性取向、性别认同等多种多样的体系相互交织发挥作用,包括种族和社会经济差距的交叉性理解、有关LGBTQ(指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上的少数群体)的交叉性分析以及跨国情境下家庭的交叉性研究^{[7](pp326-345)}。这三种理论视角之间虽彼此独立但又相互交叠,它们共同指向对知识和权力的激进批判,因而实际上

也可以视为女性主义研究范式的不同阶段或面向。

然而该文指出,这三种不同理论范式之间也存在着一一定的张力,因过去十年来交叉性视角得到广泛应用,但是作为一种源于黑人女性主义批判源头的理论,在被白人中产阶级和多学科挪用的同时,却被抹去了其中反霸权的部分,这种“去政治化”色彩造就了当代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流行以及黑人和有色人种女性的再度边缘化。尽管交叉性理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如何应用的方法探索还在继续,但是过去十年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却摒弃了“女性主义”这个术语,更喜欢用社会学中的权力框架来分析性别关系,或者情愿诉诸第一种以性别作为分层机制的研究范式^{[7](PP326-345)}。显而易见,比起20世纪中晚期女性主义进军学术界的不可阻挡之势,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过去十多年女性主义在社会学中的影响力与其说是“革命”或者“改造”,不如说是日益被“瓦解”成为碎片化的多元话语。现实世界中愈演愈烈的身份政治撕裂,与学术研究中同时并存的“去政治化”趋势,成为女性主义在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呈现的新特点。

二、中国情境下社会学中性别研究的演进脉络： 从女性研究、女性社会学到性别社会学

由于独特的学术与社会历史情境,中国社会学中的性别研究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与西方不太相同的路径。从社会学自身的发展脉络来看,中断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社会学在历经几十年后恢复重建时,起初的目标就是回应社会变迁遇到的问题,并以西方社会学为参照致力于培育规范化、专业化的学科体系和共同体。而到21世纪之后,社会学在回应社会现实需求的同时,开始逐渐转向寻求并建构中国本土的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社会学的这一重建过程正好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实践同步,因而使得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本身带有鲜明的时代、本土和全球特点^[8]。

这些特点在性别研究的中国化演进脉络中也有相似的体现。宋少鹏通过对近代史的考察发现,以“妇女问题”为导向的妇女研究在中国已有百年历史,新文化时期的知识精英们正是通过“妇女”和“妇女问题”的发现,揭示了当时社会问题的症候。

而如今“性别社会学”的出现与成长,伴随的正是作为革命传统的“妇女研究”的相对“退潮与消隐”^[9]。如果将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作为分水岭,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内性别相关领域经历了一个由妇女研究到性别研究的转变。这并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而是“体现了研究立场从妇女本位向性别本位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以妇女解放为目标的极具政治色彩的妇女研究,朝着以追求知识的普遍性为目标、更具学院气质的性别研究的转向,它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流行的某种程度的“去政治化”倾向^[10],因此与社会学重建之初所追求的规范化、专业化潮流不谋而合。

'95世妇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性别研究学术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就在于借着这一得天独厚的国际性“主场”交流活动,性别议题和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从西方引进的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gender)等概念和理论在国内也轻松获得了通关卡,继而引爆了学术界新一轮的性别研究热。不管当时的学者曾经把它命名为怎样五花八门的名字,女性主义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带有异域色彩的时尚思想标签,曾给学界一向沉寂无声的边缘领域带来了长达10年甚至更久的追捧和热潮。因主流化或称与西方“接轨”正是当时国内整个人文社科界的整体焦虑,如同21世纪以来本土化成为替代性的新的焦虑一样。正是借助这一时机,女性/性别研究得以“从隐性变为显性,从描述性研究转向概念和理论建构”^[11],进而向学科化和主流化迈进了一步。与这一过程相伴的是,女性/性别研究的学者们在经历了从“悬浮”状态的研究“蜜月期”坠入日益远离学科主舞台、陷入几近自我封闭和自我言说境地的“瓶颈期”之后,在徘徊与自省中逐渐走出试图建立独立的“女性学”或称“女性研究”的跨学科庞大计划,重新回归与既有传统学科融合的路径。

1. 社会学重建以来性别研究前三个阶段的学科化尝试

佟新在2008年回顾此前社会学中性别研究的30年历史时,曾将这个�过程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初到'95世妇会之前的“妇女问题的呈现阶段”,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中

叶世妇会前后至新世纪之交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后的“妇女问题理论化阶段”,第三阶段为2000年之后性别视角广泛纳入社会学研究领域而产生的“将社会学问题性别化阶段”^[11]。从研究旨趣和特点来看,这三个阶段可以分别对应于女性研究、女性社会学和性别社会学的不同范畴,尽管它们彼此之间并非那么界限分明,而是经常交叉混用,但可以大致看出性别研究与社会学之间在转型期的中国特定语境下相遇的学术路径——从彼此分离、遥相呼应到相互交融的演进脉络^{[12](PP130-152)}。

但也有学者将学科角度的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发端一直向前推进到20世纪80年代,认为当时妇女问题已经进入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尽管最先大多“寄宿于婚姻家庭研究之中”,女性还没有成为被研究的主体,因此从研究者的立场来看还“很难说是一种女性社会学研究的立场”。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和性别视角的引入,女性社会学从对“问题”的研究转向了对“人”的研究,即更多地将妇女作为一个“人”的主体而不仅仅是一个“问题”的主体进行考察和分析,并进一步转向对“性别人”——社会性别本身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在方法论立场上也出现了分野,由原先追求“无性别偏见”的价值中立更多转向“偏向于女性”的女性主义价值取向,同时在理念上也从对妇女的特殊性的关注,转向对其背后具有普遍意义的性别文化影响的关注^[13]。

在王金玲看来,从学科定位的角度,女性社会学既归属于社会学分支,又归属于女性研究分支,因而在初始阶段具有“双重依附性”,在社会学中更多被置于婚姻家庭研究中“作为一个变量而非主题”存

在,而在女性研究中则由于缺乏一种学术专业意识,往往“激情思辨多于理性分析”,使得研究常常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境况。王金玲在2000年明确提出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化建设问题,指出它应该作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存在,摆脱依附地位,从女性的、本土的、社会学的立场出发,在对男性主流社会学和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进行再认识和再诠释的基础上,“力图形成自己的女性化加本土化话语与体系”。她反复强调,“女性与本土,便是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基本立场与方法”^{[13][14]}。这一点也自始至终贯彻到了21世纪初由她主编的第一本《女性社会学》教材的整体构想中^①。当时她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基本判断是:虽然研究比较热,大学课程设置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社会学中仍处于边缘地带,研究思路和方法上本土化不足,因而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15](PP4-6)}。

不过从社会学中性别研究的后续发展来看,当时想要建立作为独立学科的“女性社会学”,如同早期想要创立独立的“女性学”一样,都过于理想化了^②^{[16](PP6-11)}。因为作为跨学科或者交叉学科,想要获得长久的生命力,除了来自现实社会的问题驱动力,更重要的还要建立并夯实自己独有的一套概念、理论和方法论根基。性别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方法资源之一来自变动不居的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和学说,尽管作为其核心概念的“gender”同时也具有研究视角和方法论的功能,但是作为女性主义知识生产的基础,女性或性别概念本身的多元性和流动性给整个研究范式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很难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和传统学科(比如社会学)平起平坐进

①该书每章基本沿用如下结构:第一节,主流社会学对某一领域或议题的基本概念和理论阐述;第二节,西方女性主义的批评和挑战;第三节,中国本土的经验研究或理论建构。

②这一点或许在性别研究圈内有争议。因为许多学者认为女性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已经借助女性主义的东风初步完成了学科化进程,包括女性学学科建设相关论文、会议或者教材在20世纪末的兴盛,一些大学开设了女性学相关课程、成立了相关的虚体研究机构,甚至个别高校有了专门的女性学系或者女性学硕士方向并延续至今,女性学相关的学会、期刊也一直作为平台在共同体内部发挥作用。然而残酷的是,这些建制上的成就并不一定能保障女性学在学术上的被接纳和地位认可。事实上21世纪以来学界使用这个名称的人日渐稀少,而获得主流学术界更多认可的往往并非单纯的女性学,而是依托某些专业化的传统学科所做的性别研究。比如《妇女研究论丛》作为核心C刊,被置于社会学的分类门下,其作为性别研究共同体所公认的“娘家”阵地的权威性,恰恰来自期刊本身对于不同专业学科范式及其研究的尊重。

行对话的可能。事实上,2000年以来,一方面性别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或视角得到了学界更多人的了解和认可,另一方面其研究热度和机会与20世纪90年代的泡沫化相比已趋于平缓。所谓“摆脱依附”的学科化方案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放弃了传统学科的珍贵资源,使得研究流于平平而无法获得主流共同体的更多认可。在这样的背景下,恰逢接受过海内外良好的专业学科训练并且熟知西方性别研究话语及其影响力的年轻一代学者的崛起或加盟,使得社会学中的性别研究并未走向想象中的自立门户或“切割”,而是顺理成章走向重返社会学的融合之路。

2007年9月中国社会学会“女性/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性别研究朝着这样一种向主流社会学的融合之路迈进了一步。专委会的创建人正是王金玲,而专委会的名称在“女性”后边加了“/性别”,第一次以官方的名义带出了“性别社会学”的提法。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学界女性(或妇女)/性别社会学的名称依然经常交叉混用^③^{[16][17]},但是研究的关注点已经从女性群体或问题境况,进一步拓展为性别作为一种值得关切的核心议题(而不仅仅是变量)、概念、视角或方法对于社会学知识生产的意义。实际上自21世纪初以来,包括王金玲在内的许多性别研究学者都开始更频繁地使用“性别社会学”的名称来概括这个研究领域和共同体,把它视为社会学大家庭中努力“从边缘走向主流”的一员,并自觉地将性别社会学本身定位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在和社会学一起经历了“西学东渐”之后,通过与学科本身的有机结合实现“嵌入式而非分离式”的发展^[18]。这种对学科的回归恰恰使得性别社会学有机会走向显学,因为性别视角

的引入对社会学的方法论和知识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学者强调,正是通过构建一套用于分析和理解中国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的本土概念和理论框架,性别社会学试图回应那些用主流的社会学正统知识和方法论无法回答或解释的女性经验或者性别不平等问题^[11]。

2. 2012年以来互联网和新媒体语境下的性别社会学^④

然而,追求并拓展专业化的学科路径、寻求为主流学术共同体所能接纳的“最大公约数”,并非21世纪以来性别社会学替代别的名称而流行的唯一缘由。2012年之后,国内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彰显个体自主性的自媒体的快速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交往以及思想和文化传播方式。性与性别作为人人可及的私人与公共话题,一跃成为长期占据网络舆论空间并引发各路争议的热门议题,加上全球范围内性与性别相关议题日益走向极化政治和多元文化,使得性别研究陷入比较严重的多重张力的撕扯,性与性别议题以“更加政治化、更加聚焦却也更为窄化”^[19]的面貌出现在各种舞台上。这期间来自西方女性主义、本土国家话语和传统文化等多种源头及立场、彼此交错或冲突的性别话语,被嵌套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本土化与全球化等宏大的话语体系中,构成了国内互联网极为复杂的文化生态,将性别议题的讨论动辄卷入对立、撕裂与站队,这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学者间的思想交流与学术对话空间,导致学术的“失语”状态和真正有价值的公共讨论的缺席^[20]。

以上这些都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2012年以来的十多年间国内社会学中的性别研究进入了与此

③例如,200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了中华女子学院名为“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知识建构”的课题,后来其成果以专著的形式出版,书名是《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知识建构》,其中将国内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化界定为女性研究与社会学研究两个学科在世纪之交发生的碰撞,性别视角的融入标志着女性社会学正在逐渐走向独立。此处虽沿用了“女性社会学”的名称,但已经具有了“性别社会学”的意涵。2007年,国内第一本以“性别社会学”命名的教材正式出版。

④这一阶段之所以选择2012年作为一个时间节点,一是考虑到移动互联网和自媒体的普及时间,因国内微信正式上线虽在2011年,但大规模使用以及微信支付的推出是在2012年;二是考虑到性别领域的一些大事件,如2012年青年女权行动派的系列活动及其影响带动了微博上性别相关热点的讨论和女权文化的传播,这一年曾被命名为“女权元年”,同时成为国内女性主义学院派与行动派分野的起点。

前极为不同的第四阶段,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当下性别研究相关话题的敏感化以及可触碰的学术空间的日益压缩或划界。甚至一些学术会议或者发表有时不得不出于避嫌而与“女性主义”的称呼割席,改为更与本土国家话语相匹配的“妇女发展”等表述。其原因除了全球范围内性别议题的普遍政治化所带来的国际大环境的冲击之外,另一点不容忽视的是,性别本身所具有的私人性、话题性和争议性使它同时具备了高流量且相对安全的特质,在国内网络和数字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不可避免地成为不同类型网站与社交媒体现有空间里硕果仅存的内容生产宠儿。在这样的文化生态和社会语境下,“性别社会学”作为更具中性色彩的学科名称或许是保全学术边界不受外在过多惊扰的最佳选择。

佟新在新近出版的那本更名为《性别社会学》的再版教材“序言”中指出,之所以采用新的书名^⑤,是因为深感无力涉猎性别研究如此多的领域以及互联网如此飞速的传播影响,因而只想限定在社会学范畴,从性别社会学视角理解生产和再生产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21]。黄盈盈在谈到最近十余年来性别研究的情境转变时,将“张力”“多方力量之间的动态博弈”等设定为现阶段的关键词,并指出在这种日益紧缩的氛围下,研究和发表正转向“以互联网为平台、以国际社会为对话语境”,而国内有限的发表更多被隐藏在性别和婚姻家庭研究或者社会治理的框架之下^{[19][22]}。这一点也反映了性别社会学最近十多年来的基本境况^⑥,即部分回归到当年第一阶段相似的状态:更多寄宿于婚姻家庭研究门下获得更大的合法性空间,或者作为当下最热门的数字时代社会治理新问题来考量。这样一种网络热而研究冷,或者日常生活实践日趋“政治化”而学术实践不得不寻求“去政治化”庇护的矛盾趋势,从当下性别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多样化生成中亦可见一斑。

三、问题与语境:国内性别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及其生成逻辑

如果把范式理解为研究共同体共享的基本理念、方法和纲领,可以发现最近十多年来国内性别社会学的相关研究(包括不一定自命名为性别社会学的研究)并非遵循同一个范式,考察并分析这些不同研究范式背后的问题和语境,可以大致梳理出中国社会学中性别研究范式的生成逻辑及其彼此关系。

1. 性别作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机制

这是国内性别社会学中堪称具有“最大公约数”的研究范式,因为它意味着性别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被纳入了社会学中最为核心的分层与不平等研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获得了与阶层、城乡、族群等主流研究领域平起平坐的可能。事实上,近些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分层研究学者以不同方式涉猎性别相关的研究。比如,对教育、就业、收入分配、消费文化等公共领域的性别分化及其影响机制的分析,以及对婚姻、择偶、生育和家庭流动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性别差异现象的解读,等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家庭一向是社会分层和地位获得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第二次人口转变和全球经济不平等的上升,家庭结构在西方社会成为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一个重要机制,这种背景下“社会分层与家庭结构相融合的研究视角”成为社会学中的一个新趋势。处于市场转型社会的中国也正在经历经济、人口和家庭的剧烈变迁,家庭结构因素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性正在上升,因此家庭与分层视角的融合在中国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中也日益凸显^[23]。性别是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联结在一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也成为影响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机理。

毫无疑问,分层研究学者的加入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性别研究范式作为不平等研究的一环在社会学中的可见度。不过通常这类研究大多以宏观意义上

^⑤该书2005年首次出版时的书名为《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2022年再版时改为《性别社会学》,并删去了原副标题,由此不难看出2012年之前和之后国内学术语境的差异和变化。

^⑥近年来国内部分高校的性与性别相关非实体研究机构在运行中遇到了一些无形的阻力,甚至处在半关停状态。与此同时尽管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机构出现或加盟,如2023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低调挂牌成立了国内首家独立的性别社会学研究实体机构,命名为“性别社会学研究室”,但其最重要的初衷之一正是来自社会治理视角的对于性别相关议题的关注和聚焦。

的定量分析居多,并且研究者大多并非女性主义学者,一般也不把自己的研究归类于性别社会学,只是从社会学主流规范的角度认同性别作为分层机制之一的重要性以及学理价值,其中也包括许多关注家庭与性别问题的人口学家。除此之外,这一研究范式的主力军还包含那些社会学中推崇女性主义价值取向和方法论的学者,他们通常更关注微观意义上的女性生活处境和经验,并将女性主义理论和视角作为解释日常生活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的主要范式。例如,他们关注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关注职场女性面临的工作与家庭冲突,关注“母职惩罚”和照料困境,关注流行话语和消费文化对于女性和男性身体、气质的形塑,关注生育政策和家庭政策是否性别友好,等等。有学者对2006-2015年国内社会学的硕博学位论文进行盘点分析后发现,性别社会学相关论文有成倍增长的趋势,并且涵盖的议题日益广泛,紧扣社会热点,研究方法也更加规范、多元,研究取向上更加开放、包容,但在概念工具和理论分析的力度上明显不足,不同类型的研究与方法之间存在自说自话、相互隔离、缺乏深度对话等问题^[24]。这种境况在近十年后的今天仍未看到有多大改观,相反,性别社会学依然未能走出理论困境,并且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隔阂和分化似乎越来越大。

2. 交叉性理论与分析策略

这是性别社会学中第二个具有较大共识面和广泛应用性的研究范式。这一理论主要基于20世纪80-90年代美国黑人女性主义对西方主流社会性别研究中白人中产女性立场的反思和批判,强调女性或性别并非同一的范畴,而是因阶级、种族、族群等身份的差异而不同,因而主张不能仅限于性别角度,还要看到边缘人群遭受的多重压迫力量是如何交叉起作用的^[25]。这一研究范式对于国内性别社会学的研究者来说具有醍醐灌顶的作用,因为改革开放后的性别研究是以性别与阶级的分离为起点的,经历了20世纪女性主义的滥觞,性别社会学中一度也曾出现不少被批评为“只见性别、不见社会”的“唯性别政治”研究,在阐释复杂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时带有“去阶级化”和“性别万能论”特征,这类研究往往因过度沉迷于性别权力关系说而忽略了市场化以来日

益凸显的城乡、阶层差别和分化等重要因素而流于狭隘。因此性别社会学中阶层和阶级分析的回归,正契合了交叉性范式所强调的将多维度权力体系之间的交织纳入整体分析视野的做法,这为社会学中性别研究的深入拓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然而正如有学者提到的,这一研究范式由于自身带有的某些局限性,在实际应用中也会面临种种问题。比如因过于强调身份政治,交叉性的边界谱系已无限扩大(如后来加入的还有少数族裔、国别、地域、宗教、文化、年龄、性取向、性别认同等),女性主义也因此被碎片化为充满张力的不同身份群体,使得研究有可能越来越远离对宏大的社会结构和不平等制度的关注。另外,由于交叉性研究范式更像是一种方法论倡导或者分析策略、一种理论视角或者立场,很难对其作出统一定义,而在具体研究实践中该如何应用和操作并没有形成定论^{[25][26]}。即便如此,国内性别社会学的一些经验研究中,尤其是劳动与性别领域关于农民工、打工妹、家政工等的大量研究中,都可以看到交叉性分析的影子。如潘毅关于20世纪90年代南方工厂打工妹的研究^[27]、何明洁关于餐馆女服务员的劳动控制的研究^[28]、杜平关于男性农民工在城乡迁移多重结构下的男性气质重塑研究^[29]、肖索未关于婚外包养关系的研究^[30]、吴心越关于养老机构护理员的研究^[31]等,将国家、资本与父权制,年龄、代际与性别,城乡、阶级与性别气质,阶层、情感与性,年龄、劳动与性别等不同维度的等级关系和权力体系交汇在一起,揭示出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村打工阶层的女性和男性在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个人遭遇和命运。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理论层面探讨了交叉性视角应用于照料体制研究^[32]、男性特质研究^[33]等所带来的启示或突破,包括新的提问方式和切入视角的产生,以及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等级关系的复杂性,等等。

交叉性理论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尽管并不完美,但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以性别作为单一范畴或视角的研究框架,也以它注重过程和情境以及对动态性、关联性和系统性的侧重而成为一种富于活力的分析策略^[32]。因此与将性别作为分层机制的第一种研究范式相比,交叉性分析不仅能够关注到社会结构不平

等的多元面向及其交叉作用,而且由于其边界是开放的、动态的,因而可以将不同社会情境下新的支配维度不断纳入分析视野^[33]。这也使得交叉性理论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具有了一种开放包容性和灵活的实践性。

3. 社会再生产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话语

相较前两种研究范式,社会再生产理论在国内性别社会学中属于更小众的一类,原因在于它尽管起源于20世纪70-8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但其核心概念和观点是在面对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扩张而产生的“重返马克思”热潮中提出来的,试图将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整合起来^{[34](PP43-59)},是女性主义“重新发现”再生产,并将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学说从一种劳动分析框架扩展到性别视野下的宏观社会理论的结果,希望将政治经济学的结构性分析重新带回到私人生活中,彻底打破公私之间的壁垒,打通家庭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关联^[35]。因此性别社会学中那些关注生育、照料问题与家庭政策的学者都会对这一理论范式感兴趣,它被视为“全球化语境下分析中国社会性别结构变迁和未来发展的重要视角”^{[36](P1)}。然而由于社会再生产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作为对崇尚“向前一步”的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批判和挑战者出现的,可视为西方新左派思潮在21世纪学术研究中的延续,本身还在不断争议和完善之中,国内性别研究和社会学圈直到晚近这些年才陆续出现少量中文的引介和研究文章,且大多停留在理论性的初步探讨和阐释阶段,因此在性别社会学中尚未看到比较成熟的经验研究范例^⑦。

此外,由于社会再生产理论特别关注国家、阶级与性别,以及妇女、劳动与解放等宏大议题,因此这一研究范式在历史社会学、社会史、社会主义妇女史等相关领域的性别研究者中受到更多关注和追捧,因此也常常与已经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

放话语相融合或交汇使用,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而想要探讨社会再生产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实践,很难绕开公与私、妇女与解放、国家与市场等话题。宋少鹏在2012年提出了“为什么中国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的问题,指出中国通过“产权的私有化和家庭的私人化实现了市场化转型”,而在家庭内部传统的性别分工没有得到彻底改变之前,“再生产职能的私人化”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女性化,其直接后果是造成妇女在“经济上的分配不公和文化上的贬低”。而主流的社会性别理论作为强调身份政治的文化批判,却无法对这种结构性压迫给出有力的反击,由于女性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暧昧的同谋关系”,因此需要重拾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资源,在自我反思的基础上“重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批判”^[37]。

在最新发表的一组关于“中国情境下的社会再生产:变迁与重构”的专家笔谈中,有学者将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兴起与20世纪90年代社会性别传入中国学界的历史语境进行了对比,指出当时正值全球范围内马克思主义范式式微、新自由主义范式崛起时期,gender的出现与引入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也是对此前以阶级解放为中心的妇女史研究的很好修正,捕捉到了那些“妇女解放话语”触碰不到、被主流叙事所遮蔽的个体经验。而时下社会再生产理论在西方的“复兴”,及时回应了与全球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相关联的结构性问题,比如照料危机并非单纯的个人或家庭问题,而是资本主义总体性危机的体现,“是以底层、少数族裔妇女为主的再生产劳动者对父权制与资本积累长期合谋的一种反抗”,同时也给那些强调性别作为权力关系维度的学者走出狭隘的妇女“特殊”经验、具备与宏观政治经济学对话的能力提供了理论资源^[38]。

在中国语境下,无论是十年前有学者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集体化时期“公中之私”“公私相嵌”的

⑦此间最有影响力的应该是2024年3月由《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与中国社会学会妇女/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举办的“生育、照料和社会再生产”线上学术工作坊,其中5位性别社会学中青年学者以“中国情境下的社会再生产:变迁与重构”为主题展开的圆桌论坛从历史、经验、国际比较和方法论等不同视角深入讨论了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本土拓展与重构问题,核心内容可以参阅《妇女研究论丛》2024年第4期的专家笔谈部分。

生产—再生产体制分析框架^[39],还是如今有学者尝试进一步提出的“生产—生活”概念或者“从生活出发”“找回生活”的“生活—生产”解释框架,都试图找到中国社会独有的“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国家话语中所蕴含的不同于西方的“生产—再生产”二分法体制的内核,从而打破“以生产为中心”的天然预设,将“生产凌驾于生活之上”的逻辑拉回到更多人向往的“以生活为中心”的新的话语体系^{[38][40]}。还有学者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家政服务行业呈现出从“社会化”到“市场化”的变迁历程,其主导的意识形态话语也从“为生产服务”转向“解决就业”乃至 21 世纪以来的“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因此国家对于这一再生产行业的定位在民生、就业、消费等不同角度之间不断切换,超越了传统再生产的范畴,也对西方过往工业化下的生产—再生产理论构成了挑战^[41]。所有这都可以视为社会再生产理论的一种富有创见的本土探索或重构。

然而社会再生产理论范式除了上述提到的“洋为中用”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水土不服”,还包括自身带有的过于宏观、缺乏中观或微观层次分析方法的局限。有学者从方法论层次提出了一些要点,强调在重返政治经济视角的同时,需要打破二元分割,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再生产”整合性视角,把它视为一个关系复合体,看到其边界的模糊与互嵌以及不同力量对于边界的共同形塑。具体到方法层面,就是要进行“生产—再生产”的关系性研究以及动态性、过程性与类型学分析,探索社会再生产理论多层次尤其是中观和微观层次的操作化路径,想象一种破除“生产”与“再生产”等级关系、超越“生产中心”的社会安排和研究思路^[42]。不过无论是“生产—再生产”还是“生产—生活”框架的讨论,都不可能绕开国家与市场、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目前国内学者将这一理论范式更多用于改革开放前的集体化时期或者延安时期等共和国史或者妇女史研究中,是否社会再生产理论范式的应用只能以集体主义或者国家主义为前提?在市场化时期它若想发挥作用的土壤和边界又在哪里?更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4. 酷儿理论与多元性别研究的本土话语

酷儿理论是 20 世纪 80—90 年代西方 LGBTQ

(性少数)运动中出现的—种新思潮和新理论,它脱胎于第二波女权运动和同性恋运动,但显然走得更远,代表了在性取向、性别认同等性相关议题上对于主流规范的一种反叛和抗争立场。将酷儿理论首次引介到国内的李银河指出,这一理论既是向异性恋和同性恋二分结构的挑战,又是向男性和女性二分结构的挑战,同时也是对传统的同性恋文化的挑战,因而酷儿理论相当于一种来自文化中所有无法归类的“非常态”东西的表达方式,指向包括多元性别在内的所有边缘群体的联合,共同反对异性恋正统的霸权,因而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和“颠覆性”^{[43](PP1-14)}。酷儿理论作为最近几十年来西方酷儿政治及其研究的主流范式,其理论资源主要来自性研究(sexuality)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学说,强调性在性别中不容贬低的重要性以及超越性与性别二元分割的多元性别话语。作为一种批判性视角,它的独特原则在于“不会赋予一种身份于另一种之上的优越性,而是允许个人或群体流动的自我定义”^{[7](PP326-345)},因此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学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操演论”或“流动说”被认为是奠定了具有社会建构论色彩的酷儿理论的核心基础。

然而,国内社会学中研究同性恋等性少数群体的几代学者—直以来都被定位或归属于性研究和性社会学的共同体,而和性别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共同体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集。这种现象或许和 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女性主义引入中国时被集中强调性别的社会文化建构性而忽略了性与身体相关的研究和理论有关,性和性少数研究因被赋予特殊的道德意涵而长期处在难以言说的、边缘的位置。有学者将这种局限性称为社会性别知识生产中的“忌性”或“反性”特点^[44],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以妇女为中心”、重社会性别而轻 sexuality 的学科特质,恰恰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学者基于自己的问题意识、为解决自己的关切而从在地出发的一种“拿来主义”策略^[45]。然而无论如何,女性主义引入中国后相当长时间内在性研究方面的“缺席”是个不争的事实,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这样一种性别知识的再生产只不过是一种“无性之性别”^[44]。因此国内主流女性主义与性研究学者之间在如何看待性工作、“扫黄”、

反性骚扰等性别治理相关议题上一直存在所谓“女权—性权”立场的分歧和争议^[19]。性社会学与性别社会学的这种分离状态一直到2012年之后才开始有了松动。黄盈盈认为这是因为最近十余年来中国性研究的情境发生了转变,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青年女权行动派的兴起,推动了网络上性别议题的讨论和传播;同时随着LGBTQ社群活跃度的增加,性少数群体进一步显性化,这波新生代的女性主义者从不忽视性和身体这一主题,而是常常从女性的性自主出发介入性相关公共议题的讨论,因此二者之间的交集也越来越多^{[19][22]}。这两股重要力量的出现得益于互联网和新媒体的传播和普及,给酷儿、多元性别研究与女性主义之间的对话、交融提供了新的机会。

在这一过程中,国内一些学者对于性与多元性别研究的本土理论和经验探索一直没有停步。如潘绥铭和黄盈盈2007年提出了“性的主体建构”理论,并探讨了这种视角在本土研究中的发展空间问题,发出了“我们是否一定要套用酷儿理论”的疑问,指出需要通过历史视角的介入,检讨中西方在性别制度上的异同,“从中国的具体情境中发掘出那些有可能发展为本土理论的闪光点”^[46]。这种“主体建构”视角在性研究中的运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性别社会学主流研究中被忽略的议题,如关于老年女性之身体与性的重新认识与文化反思,批评了既有研究中被“窄化的老”“缺场的人”和“狭隘的性”,打破了老年的性等于老化的性之偏见或污名^[47];而关于城市公园老年相亲角的观察,也冲破了老年“忌性”或者“无性”的传统道德禁区,揭示了老年人在相亲实践中决意“为自己活一回”而不避讳谈性和爱的个体化追求与主体性困境^[48]。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台湾地区学者何春蕤等人为将主流女性主义框架下被遮蔽的身体、性等议题解放出来而自创的独特中文表达——“性/别”概念及其理论,强调了性与性别之间“性中有别”的关联性及其区分,凸显了性在其中的重要性以及性别的流动、多元及其暧昧复杂特点在性别研究中的位置,构成了近年来中国性研究本土框架的重要部分^[22]。黄盈盈正是借用了这一框架并延展到关于“情欲身体”的考察和作为边缘群

体的“小姐”的研究,打破了公众话语中关于女性情欲身体处于危险—愉悦、压迫—自主、结构—能动等二元对立框架下所形成的叙事套路,即情欲的危险性、受压迫性与困于结构的被动性,从而提供了性产业中“小姐”对性自主的另类理解^[49]。

除此之外,国内有关性少数的研究也一直试图寻找一种本土情境下的概念和经验呈现方式。多位学者将同性恋议题放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考察了中国语境下同性恋与城市空间之间的关系及其演变,包括对不同于西方“隔离聚居区”的东北“点儿”和成都“飘场”等具有本土特色的酷儿空间以及同性恋亚文化中以“眼神”交流为主的一套独特的符号化语言的发现。同时探讨了中国语境下同性恋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50](PP38-52)[51]}。大量的民族志研究还发现,十年前中国的同性恋群体尚未形成一种身份政治,因此尽管未能获得制度上的承认,但在主流社会相对平和而宽容的氛围里,他们“以一种不与制度正面冲突的迂回方式顽强而巧妙地生存下来”^{[50](PP38-52)},因此有学者主张不同于西方社会基于个人主义的同性恋群体权利争取和实现模式,中国社会可以独辟蹊径,创建出一种基于家庭主义的同性恋群体社会融入模式,以“回家”而非照搬西方的“出柜”策略将个人的性取向纳入家庭亲缘系统之中来实现融合^[52]。

然而这一段曾被圈内学者称之为LGBTQ研究“黄金期”的岁月并没有延续太长。从知网相关数据可以看到,性少数与多元性别相关研究的期刊论文发表蓬勃期结束于2018年,之后在中文世界人文社科的出版物中这一主题几乎消失殆尽,似乎成了无人问津的领域,偶有发表也多是幻化或包装成其他领域的研究。最常见的是家庭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如魏伟关于同性恋伴侣的生育安排以及隔代育儿的分析^{[53](PP63-85)};也有社会治理视角的研究,如魏伟关于同性恋群体的本土社会融入模式的探讨^[52];还有方法视角的研究,如王丽圆关于异性恋女性研究者进入男同性恋亚文化群体进行田野调查的方法反思^{[54](PP236-264)};等等。中国多元性别研究更多被置于交叉性分析框架下,或者将本土化的理论探寻作为其主要的努力方向。

有学者试图将酷儿理论从 LGBTQ 的专属标签下脱离出来,指出酷儿研究并非只是一种与性和性少数相关的理论。这一理论焦点在西方已经“从过去专注于同性恋主体的压迫和解放,转向对制度性实践和话语的分析,关注这些话语是如何生产关于性的知识,使其成为组织社会生活的重要原则”,因此这一研究范式可以不局限于性少数群体甚至突破性少数群体话语的限制,聚焦对整个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揭示和干预,将酷儿视角向主流研究拓展,从而达到将主流“酷儿化”的目的^{[55](PP2-6)}。曾经怀抱着雄心想将酷儿理论从面向性少数群体的多元性别理论延展到更具一般性意义的社会理论、进而尝试“酷读中国社会”的学者,那时候可能未曾料到,继 2018 年之后性少数研究想要在中国实现的更切实的目标,是如何让它合法地生存下来。由此看来,这一研究范式与性别社会学的其他范式相比,是更小众的一类,通常与性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绑在一起,同时也和女性主义理论及其方法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交叉性理论和分析策略就是酷儿研究中最常用的范式之一。酷儿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由于研究对象群体以及议题的私密性、封闭性和敏感性,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一向来自 LGBTQ 的圈内人士为主。从方法论角度说,局内人研究局内人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都很常见,这也使得研究本身的反身性变得异常不可或缺——因为这类研究与行动倡导和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更加密不可分。总体来说,中文发表的困难,很大程度上“劝退”了一些对 LGBTQ 感兴趣的学者,也让一些来自一线本土经验研究成果不得不转向海外英文发表。

需要指出的是,最近十多年来性别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并不止于上述四种类型,还可以继续细分,比如男性研究的范式近些年来发展迅速;也可以增加新的类型,比如早期性别与发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简称 GAD)的研究范式^⑧。后者在女性主义引进中国后的前 20 年曾如火如荼,成为“性别主流

化”政策下一个最核心的框架,也是最能集中体现女性主义行动导向的研究范式。有学者认为,Gender 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进入中国时的一个重要管道就是通过国际援助机构支持的发展项目,以及“妇女与发展”“性别与发展”这些话语在学术界和行动界的快速传播^[56]。这类性别敏感型的干预性发展项目,目标直指促进性别平等或者妇女自身的赋权和发展,因此项目的内容通常和健康、教育、反贫困、反性暴力等关联在一起,很容易和中国性别政策中强调的“男女平等”以及“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理念对接。GAD 范式强调将性别关系视为重点,将妇女的本土经验和本土情境纳入整个发展议程,解决造成性别不平等的结构性根源。然而 21 世纪以来围绕这一范式理念和实践的争议不断,如被批评为“西方中心论”、理论本身和发展中国家妇女实践存在脱节,等等^[57]。最早介绍并在中国实践国际性别与发展框架的李小云团队认为,这一范式是基于西方女性主义与发展主义在建构和实践中形成的,但在运用于发展中国家时遭遇了社会文化困境,包括妇女被“客体化”和“他者化”,被视为简单的“受害者”而非“能动者”,忽略了性别关系的文化多样性等;同时,这种框架是以西方的个体主义为中心,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家”“户”和个体之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二者之间呈现出某种张力。例如这一范式应用于中国的 GAD 项目实践中时,在技术层面出现了不适应性,在结果上出现了“机会和福利异化”的现象^[58]。还有学者批评了项目实践中存在的如对发展主义逻辑缺乏反思、忽视农村妇女的差异性和情境性以及来自妇女自身声音和主体性的忽略等问题^[59]。

过去十多年来这一研究范式在中国的逐渐式微,还与海外基金会的资助取向及相关 NGO 机构的活动调整有关,也和性别领域学院派与行动派的彻底分离以及各自的专业化分化密切关联。高小贤曾将 GAD 的行动者称为“逝去的知青代”,认为在 21

⑧国内一些性别研究学者如高小贤更喜欢用“妇女/性别与发展”来指称这一范式在中国脉络里的呈现方式。因为虽然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理论经历了由妇女参与发展(WID)、妇女与发展(WAD)到性别与发展(GAD)的演变历程,但对中国而言均为 20 世纪 90 年代同步传入的,并与中国在地的女运经验相对接,这类项目通常具有“以妇女为中心,以社会性别意识培训为工具切入”的特点。

世纪之初成立 GAD 网络时,他们就将“推动中国的社会性别与发展理论的本土化”、在交流与碰撞中“积累中国经验和建构本土理论”作为重要目标,在通过行动项目改善底层妇女的健康、教育、生计等状况的同时,力争缩小性别差距,积累和创造一些成功的本土案例和经验^{[60](PP166-180)}。高小贤认为,这些中国经验之一就是 GAD 项目本土化过程中集体主义发挥的重要功能,即“妇女/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的实践中和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妇女工作手法的结合”。然而,项目实施过程中专家、受益者和资助机构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及其不同价值取向带来的张力,也会对项目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事实上,2008 年之后国际发展援助机构大量退出中国,继而 GAD 在中国公益界越来越走向边缘化^[56]。随着性别研究的代际更替以及中国社会语境和 NGO 整体生态的变化,这种集研究与行动于一身的模式可实现的空间越来越小,既往 GAD 项目也面临着实践上难以持续或者在理论上无法提升等问题。因此过去十多年来这一范式下的项目和共同体许多已悄然停摆或者默默转型,其中一部分纳入了官方的“妇女发展”话语^⑨,成为主流性别意识形态和政策纲要的一部分;另一部分转向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俗文化、“非遗”研究等更加宽泛且自上而下的领域,但在多大程度上还保留了 GAD 原先的理念已不好说,这也是本文未将其作为当下独立的性别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原因。

四、结语:探寻性别自身的社会学想象力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发现,从学科成长的角度来说,性别社会学在中国从无到有的发展,依赖于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范式的引进恰逢社会学重建的规范化、专业化进程,而改革开放与市场化转型为中国本土问题和范式的生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社会语境。

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女性主义试图对社会学进行从议题、视角到范式的“改造”,然而尽管他们

在批判、纠偏或填补空白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甚至其学术影响力“已经使得以往各个学科之间以及学科内部的分际重新洗牌”^{[2](P3)},但终究难以完成当初所设想的社会学的“女性主义革命”,因为建构一个新的知识框架,远比批判或推翻一个旧的要难得多。过去十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风云变幻,性别成为被裹挟其中的一个“大女主”,不得不在随波逐流中贡献出自己多变的舞台。从研究范式来看,西方女性主义至少构建了三个相互交织的理论范式:将性别作为系统性分层机制的视角、女性主义行动导向的视角和交叉性理论的视角,它们之间相互承袭而又充满张力,给社会学中的性别研究提供了多样化的可能。在此期间现实中的“泛政治化”与研究中的“去政治化”的并行趋势,给未来社会学中的性别研究又增加了几多不确定性。

与西方的演进脉络不尽相同,自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中的性别研究经历了女性研究、女性社会学、性别社会学三个不同的学科化阶段,性别研究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也从彼此分离、遥相呼应走向相互融合,这意味着曾经热衷于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女性研究或者女性社会学交叉学科的设想走到了尽头,而性别社会学专委会的成立,意味着学科化朝着重返社会学而非自立门户的方向迈进了一步。2012 年之后的性别社会学进入了以网络新媒体时代为特征的第四阶段,性别议题在国内多重话语和极致流量化的压力下成为敏感的、可触碰空间日益狭小的领域,这也使得性别社会学的名称成为保全相应学术边界不受外在惊扰的最佳护身符。

最近十多年来国内性别社会学在问题与主义、学术与政治的两难中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范式,其中第一种范式将性别作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机制纳入社会学中不平等研究的核心框架,强调了性别作为一种权力等级关系对于社会制度观念和实践无处不

^⑨宋少鹏指出,“妇女发展”的概念既承认妇女现状的不完善性,又具有发展提升的可能性与未来趋向性,因此非常符合改革开放时期强调“发展就是硬道理”的主流理念,也很容易为那一代妇女研究学者所接纳,因此具有强烈实操性、介入性与社会改造倾向的“妇女与发展”以及 GAD 理念与中国本土的妇女发展理论之间能够达成无缝衔接。自 1995 年起,国家开始制定并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成为指导中国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的主流框架。

在的影响,从而极大增加了女性主义和性别视角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可见度;第二种范式将当初被分离出去的阶级、城乡等重要维度重新带回到性别研究中,强调跳出以女性或性别为单一范畴的解释框架,真正关注到处在结构不平等之网中的多重权力关系及其交互作用的复杂性;第三种范式不满于女性主义应对新自由主义结构性压迫的无力,呼吁重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以再生产劳动作为切入点,重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并结合中国本土的妇女解放国家话语,构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生产—再生产”框架的“生产—生活”话语体系;第四种范式用“酷儿”将所有在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上无法归类的“非常态”边缘群体聚合起来,并试图探寻在中国语境下的性和性少数研究中所呈现的本土经验及其理论回应。

不难看出,上述四种研究范式均来自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带有共通的批判性视角,其中交叉性理论和酷儿理论因与多元化、碎片化的身份政治紧密关联,因而具有更突出的后现代意味。还需看到,这些不同的研究范式之间并非界限分明,而是相互承继、彼此嵌套,或者相互交错、彼此冲突,其宗旨无非对不同时代变动中的性与性别问题以及女性处境的困扰作出回应。在这些回应中,性别社会学始终难以绕过的是无法摆脱的二分法纠结:性还是性别、差异还是平等、主流还是边缘、底层还是精英、个体还是结构、立场还是方法、本质论还是建构论,等等。而对于国内性别社会学的研究者来说,还需加上一个萦绕不去的终极追问:西方的还是本土的。这种探问也构成了中国语境下性别社会学最为核心的生成逻辑。

有学者指出,国内性别社会学面临着三重张力:第一重是本土知识生产与西方范式之间的张力,第二重是学者之间的代际张力,第三重是性别社会学的知识生产与性别平等实践之间的张力^[61]。其实还要再加上一重,就是不同研究范式和共同体之间的

张力。还有学者强调,“作为组织化与制度化的性别社会学的确立,不只是把性别作为一种合法知识的确认,更重要的是对于性别化社会的经验事实的确认”,因此在推进研究走向更加“精细化与专业化”的同时,仍然需要把性别“还给社会”,防止出现脱离生活经验的“技术化与狭隘化”^[9]。然而不同学者对于所谓“经验事实”的认知有可能大相径庭,因此性别不仅需要还给其生长于斯的社会,而且需要还给作为知识生产出处的范式和共同体,从这种意义上说,来自性别社会学自身的反思也构成了性别知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有学者公开呼吁结束长期以来这个领域有关性和性别、性权和女权、男性研究和女性研究、性社会学和性别社会学等之间的分离与隔阂状态,试着开启自觉、友善、情境化的、开放包容的跨界对话空间^{[62][63]},这或许是性别社会学未来走向大共同体必须面对的功课。

除此之外,近十年国内性别社会学的研究者在反思自己的学术传统并应对来自共同体的追问的同时,还需及时关注并检视主流的国家学术话语,让有关性别政治想象力消弭在社会学的学术想象力中,也就是构建并不断更新关于性别何以社会学的合法性框架。从近些年圈内诸多学者的努力中可以发现,性别社会学构筑合法性的常见策略,主要体现在对于性别研究议题和方法的各种包装、挪移上,概括起来说,包括但不限于性别议题的分层化、家庭化、社会治理化和方法论化等。这些策略体现了有些学者所倡导的从“历史的内在视域出发”的方法论取向^[44],因为当下在地的研究实践及其问题和语境,也构成了未来性别社会学学科历史的一部分。同时这也提示我们,性别并非仅仅是身体、社会或文化建构的产物,国家力量也是性别和性别研究的塑造者。因此,如何在现有国家话语的框架内建构并拓展自己的研究空间,同时对这样一种力量保持一种持久的反身性思考,也是中国学术语境下探寻性别自身的社会学想象力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美]达维逊、果敦著,程志明、刘丽、宋坚之等译.性别社会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2][美]阿博特,[英]威莱丝,[英]泰勒著,王金玲、姜佳将、宋瑜等译.女性主义视角的社会学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22.

- [3]子金.2023年的社会学:我们是否真的实现了女性主义的范式转变?[EB/OL].微信公众号“子金”,2024-04-02.
- [4]吴小英.“他者”的经验 and 价值——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尝试[J].中国社会科学,2002,(6).
- [5]Stacey,J.,and Thorne,B. The Missing Feminist Revolution in Sociology[J]. *Social Problems*,1985,32(4).
- [6]Stacey,J.,and Thorne,B. Is Sociology Still Missing Its Feminist Revolution?[J]. *Perspectives:The ASA Theory Section Newsletter*,1996,18(3).
- [7]Few-Demo,A. L.,and Allen,K. R. Gender,Feminist,and Intersectional Perspectives on Families:A Decade in Review[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2020,(82).
- [8]周晓虹.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学重建的话语叙事——以40位社会学人的生命历程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22,(12).
- [9]宋少鹏.百年回望:从“妇女问题”到“性别社会学”[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4,(1).
- [10]吴小英.性别研究的中国语境:从议题到话语之争[J].妇女研究论丛,2018,(5).
- [11]佟新.30年中国女性/性别社会学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08,(3).
- [12]吴小英.回归日常生活:女性主义方法论与本土议题[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
- [13]王金玲.社会学视野下的女性研究:十五年来的建构与发展[J].社会学研究,2000,(1).
- [14]王金玲.学科化视野中的中国女性社会学[J].浙江学刊,2000,(1).
- [15]王金玲.女性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 [16]张李玺.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知识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 [17]祝平燕、夏玉珍.性别社会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18]王金玲.2000-2007:妇女/性别社会学的西学东渐之路[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 [19]黄盈盈.性之变:改革开放40年的梳理与思考[J].社会学评论,2020,(2).
- [20]吴小英.性别研究方法论再审视[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4,(1).
- [21]佟新.性别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 [22]黄盈盈.中国“性”研究:学科脉络与跨界对话[J].妇女研究论丛,2024,(3).
- [23]张春泥、谢宇.家庭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上篇):研究视角的融合[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2,(5).
- [24]李洁.性别社会学学位论文发展现状与趋势——基于对2006-2015年中国社会学硕博学位论文的分析[J].妇女研究论丛,2019,(4).
- [25]苏熠慧.“交叉性”流派的观点、方法及其对中国性别社会学的启发[J].社会学研究,2016,(4).
- [26]常佩瑶.交叉性理论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困境[J].妇女研究论丛,2022,(2).
- [27]潘毅著,任焰译.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 [28]何明洁.劳动与姐妹分化:“和记”生产政体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9,(2).
- [29]杜平.男工·女工:当代中国农民工的性别、家庭与迁移[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
- [30]肖索未.欲望与尊严:转型期中国的阶层、性别与亲密关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 [31]吴心越.照料劳动与年龄困境:基于养老机构护理员的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21,(4).
- [32]肖索未.照料劳动与社会不平等:女性主义研究及其启示[J].妇女研究论丛,2020,(5).
- [33]杜平.重申交叉性:男性特质的理论突破与研究启示[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
- [34]董一格.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视野下的共和国性别史研究[A].王天夫、严飞.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八辑)[G].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 [35]李洁.重新发现“再生产”:从劳动到社会理论[J].社会学研究,2021,(1).
- [36]《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中国情境下的社会再生产:变迁与重构”专家笔谈:编者按[J].妇女研究论丛,2024,(4).
- [37]宋少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妇女——为什么中国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J].开放时代,2012,(12).
- [38]董一格.生活的经纬:从中国现当代工业史视角重构社会再生产理论[J].妇女研究论丛,2024,(4).
- [39]宋少鹏.从彰显到消失:集体主义时期的家务劳动(1946-1966)[J].江苏社会科学,2012,(1).
- [40]宋少鹏.从“生活”出发:再思集体化时期的“再生产”实践[J].妇女研究论丛,2024,(4).

- [41]肖索未. 从家政行业发展浅谈我国市场改革后生产—再生产关系变迁[J]. 妇女研究论丛,2024,(4).
- [42]苏熠慧. 政经视角下分析中国再生产问题的方法初探[J]. 妇女研究论丛,2024,(4).
- [43]李银河. 译者前言:关于酷儿理论(queer theory)[A]. [美]葛尔·罗宾等著,李银河译. 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G].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
- [44]黄盈盈. 反思 Gender 在中国的知识再生产[J]. 社会学评论,2013,(5).
- [45]宋少鹏. 立足问题,无关中西:在历史的内在脉络中建构的学科——对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思想史考察[J]. 妇女研究论丛,2018,(4).
- [46]潘绥铭、黄盈盈. “主体建构”: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及本土发展空间[J]. 社会学研究,2003,(3).
- [47]周柯含、黄盈盈. 老化中的主体“性”——对老年女性之身体与性的研究[J]. 妇女研究论丛,2019,(1).
- [48]张骁健. 未完成的个体化:老年公园相亲实践中的主体性及其制约——基于北京市 C 公园相亲角的研究[J]. 妇女研究论丛,2021,(5).
- [49]黄盈盈. 困于二元话语的女性身体:公共事件中性/别议题的再审视[J]. 探索与争鸣,2023,(7).
- [50]富晓星、吴振. 男同性恋群体的城市空间分布及文化生产:以沈阳为例[A]. 杜澄、李伯聪. 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第1期)[G].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 [51]魏伟、富晓星. 城市、空间和同性恋——中国本土经验以及区域差异[J]. 青年研究,2013,(1).
- [52]魏伟. 同性恋群体的家庭主义社会融入模式[J]. 甘肃社会科学,2023,(1).
- [53]魏伟、高晓君. 中国同性育儿家庭中的隔代照料[A]. 周晓虹、谢寿光. 中国研究(第25期)[G].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 [54]王丽圆. 我和我的“男朋友们”:主体间性视角下的亚文化研究方法思考[A]. 赵联飞、赵锋. 社会研究方法评论(第4卷)[G].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4.
- [55]魏伟. 酷读中国社会:城市空间、流行文化和社会政策[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56]宋少鹏、高小贤. “妇女/性别与发展”在中国:历史语境、组织实践、理论反思[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
- [57]张传红、林海森. 全球南方视角下的性别与发展范式转型与实践路径[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3,(5).
- [58]徐进、李小云、武晋. 妇女和发展的范式: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实践张力——基于中国和坦桑尼亚实践的反思[J]. 妇女研究论丛,2021,(2).
- [59]向荣. 农村妇女与人口流动的社会性别与发展再反思[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2,(4).
- [60]高小贤、宋少鹏. 社会性别进中国:历史进路与理论反思[A]. 宋少鹏. 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8辑)[G].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 [61]苏熠慧. 浅谈中国性别社会学的认识论基础[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4,(1).
- [62]黄盈盈. 争论与生成中的“性—性别”:概念及其关系的辨析[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4,(1).
- [63]杜平. 男性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批判性研究领域[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4,(1).

责任编辑:含章